

第六章 工運領袖的生涯及類型分析

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說，行為反映一個人的本質，一個人的本質左右他的行為¹。但人的行為如何產生？行為科學家的研究顯示，由於人的動機（motive）、目標（goals）和感知（perception）的不同，人的行為也就相異的²。湯普森說，工人階級並不是像太陽般在選定的時間中就會自動崛起，它的崛起是由它自己創造的³。王世榕強調，工會要發展必須依工會運動起家 and 茁壯，要推動工會運動，最重要就是要有一批高瞻遠矚、熱心獻身的工會領袖，否則無法動員而朝向目標邁進⁴。

尼克森說，領袖人物必須看到凡人所看不到的，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一個成功的領袖人物總是放眼向地平線外展望，視野總比別人看得更清楚。也因此一個從事渺小事業的堅強領導人，可能壓倒一個從事重大事業的軟弱領導人⁵。

領袖角色既然如此重要，那麼台灣工運領袖影響力的來源又是什麼？再者，面對弱勢工會處境及勞工自覺意識的脆弱認知，挺身成爲一名工會的領導者，其思想的啓蒙發端何來？工人自我認識緣起及領導工人的起心動念所恃爲何？以下試以個人與其所處人、事、物間的轉變爲基礎，抽繹其思想、感覺、態度、情操的特色，分辨台灣工運領袖之啓蒙異同。

第一節 言論思想之發饋

華勒沙以一位初中學歷的電工工人當上波蘭首屆民選總統，「工人總統」也成了台灣工運界的奮鬥目標。「台灣可能出現華勒沙嗎？」更是工運領袖長久談論的話題。台灣工運發展，由於勞動法令的結構性封閉，使得工運領袖在不時代背景下，因發展取向不同，成就

¹ 莊耀喜編譯（1991）。《馬斯洛—人本心理學之父》，台北：桂冠出版社，頁 19-37。

² 游伯龍（1987）。《行為的新境界—理論與應用》，台北：聯經出版社，頁 13。

³ 錢乘旦等譯（2001）。《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南京：譯林出版社，頁 1-7。

⁴ 王世榕（1998）。《勞動話題》，台北：勞工研究資料中心，頁 91。

⁵ 尤聰等譯（2000）。《改變歷史的領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 13-18。

也各異，有人走入國會殿堂、有人成為政府官員；也有人採取街頭抗爭，有人成了「階下囚」；有人則背著工運圖騰，成了企業界棄嬰，只得靠打零工過活。這些人是怎樣看待自我的「實踐」過程？又是怎樣的信念，讓他們義無反顧？

西方工人領袖階級意識源起，多半源自於工作處境中勞資結構；台灣因特殊歷史結構關係，工運領袖產生相當多樣，有人源自政治啓蒙、有人受左翼思想的洗禮、有人是因周遭生命自覺、有人則是黨國刻意栽培。下面就工運領袖發展出各自不同的心路歷程與行動模式做一探討。

一、先有政治啓蒙、階級覺醒在後

黨外雜誌與黨外運動，往往是啓發體制外改革者走上工運相當重要的介面，訪問中的劉渤、鄭村棋表示，因緣於黨外雜誌閱讀，因而激發選擇替弱勢發聲的信念。簡錫堦、郭國文、白正憲、黃清賢、郭吉仁等則是參與黨外運動走上工運路。

「我是外省第二代軍人子弟，家裡生活很單純。退伍後，考進台電，被派到屏東坊寮工作，開始接觸基層農、漁村民眾，看他們清苦過日子，給我很大啓示。後來接觸黨外雜誌，如李敖、鄭南榕、陳水扁的文章和言論，體認社會不是小時候想像那麼單純，並期許自己應該替弱勢團體講一些話。」（劉渤）

「小時候對政治、社會脈動沒什麼感覺，1978年左右，有一次與女友（輔大教授夏林清）逛街，看到書報攤賣的黨外雜誌就脫口說：『這種雜誌很難看！』她也說：『你沒看怎能說很難看？』受此刺激就拿了幾本認真看，發現與過去理解不太一樣，以後就常看黨外政論雜誌，並對國民黨的作為產生質疑。後來到國外留學，時常一個人開4、5個小時的車到紐約聽政治演講，我也常到華人社區關心政治運動。尤其是保釣活動期間，更有機會看到很多社會民主運動，當時就下定決心，希望能從事勞工運動。」（鄭村棋）

「高中時期開始接觸政治與反對運動書籍，1980年美麗島事件後，

為黨外雜誌畫政治漫畫，之後加入新潮流，發起『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以及『台灣人權促進會』。」(簡錫堦)

「在學生時代就接觸反對運動，並認識一些民進黨人士，1989年幫洪奇昌在台南市競選，1991年幫蘇煥智參選國大，蘇當年沒選上，繼續準備選立委，於是留在蘇服務處，1992年在服務處接觸到勞支會(勞陣前身)，走上工運之路。」(郭國文)

「高中時期就常去聽黨外人士發表的政見會，聽到一些課本上所沒有的，心裡就很爽，有投票權開始就沒有投給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在很多問題上根本是在掩蓋事實？」(白正憲)

「我很早就參與黨外運動，也是民進黨創黨黨員，一個偶然機會看到楊青矗寫的《工廠人》這本書，楊青矗是高雄煉油廠電工維護人員，他將煉油廠勞工悲哀處境用小說形式寫出來，於是勾起我要站出來替員工抱不平的決心。我認為勞工運動可以和政治反對運動搭配在一起，藉此打破政治禁忌，同時推動階級運動。也因此，我才會想在我的工作單位做為切入點，出來參選工會代表。」(黃清賢)

「我在嘉義出生，父親是牙科醫師，沒有政治背景，大學唸東吳大學念法律系，接受西方的民主法治訓練，畢業後曾擔任三年法官，之後擔任律師，恰好台灣政治環境改變，於是就參加反對黨民主運動。」(郭吉仁)

從訪談中發現，台灣工運領袖，階級意識的自覺，多半源自於政治啓蒙，公民意識是發饋工運領袖勞工意識的重要介面，在政治威權與一黨獨大的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社會認知與不滿，成就台灣工運領袖政治自覺先於階級自覺的特點。不過，簡錫堦、郭國文、黃清賢、郭吉仁在黨外運動中已清楚選擇政治與工運結合，且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因此與民進黨間的關係比較緊密，也獲得民進黨的回饋與奧援；白正憲雖很早就政治覺醒，但未參與政治運動，相對政黨也未對其特別關切。

二、左翼思想的引導

除了政治自覺外，許多工運領袖也從左翼思想中找到支撐力量。Marx 是他們心中的信仰，深深影響他們。

出身眷村，進入軍校的汪立峽對論述階級處境的知識有莫名的憧憬，一本描述《紅色普魯士》的馬克斯傳，為他日後勞工運動紮下理論基礎。吳永毅就讀師大附中就接觸左派思想到留學柏克萊時參與左翼運動，緣定一生的工運活動。簡錫堉從讀書會討論中了解社會主義非等同於暴政的假面，進而對弱勢階級社會處境有進一步的看法。至於來自於反殖民運動家庭的林書揚，在左等於紅，紅即共產黨同路人的時代，左翼思想標籤使他蒙遭政治破壞，埋葬其三十多年的黃金歲月。

「我在眷村長大，父親是兵工廠的工程師，很喜歡看書、看雜誌，且大都與政治、時勢有關，我常常似懂非懂的拿來看，因此政治上我比同年齡人早熟，高中就接觸社會主義，進入軍校，有許多否定社主義的書籍，但讓我對社會主義有更深切體認。我記得有位建中畢業的同學，介紹一本正中書局出版的《紅色普魯士》（就是馬克斯傳），要我好好讀一讀；這本書是用批判否定馬克思，卻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中文的馬克斯傳記，給我很多啓發，對我後來從事社會運動，尤其是勞工運動，紮下一定的基礎」。（汪立峽）

「在淡江大學唸建築系時，由兩位師大附中學長帶領下，認識了李雙澤、王津平等，同時接觸到左派思想，在美國柏克萊讀建築系，與社會學較無關係，但建築系老師，有一半以上是屬於 60 年代左翼運動的社會參與者，對我影響很大。三年學業除了必修課外，大都選都市計畫、社會學等左翼理論的課程。當時校園裡，左派的思想、社會參與的風氣十分濃厚，除了學校之外，居住環境，從舊金山柏克萊校區也都瀰漫這股風氣，校外舉辦的影展、書展，幾乎都是左派的活動為主，那三年對我影響很大」。（吳永毅）

「當初老賀（賀端蕃）組讀書會。第一階段先從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社區權力結構與派系等學起；第二階段則討論馬克思社會主義。

剛接觸社會主義思潮，的確似懂非懂、渾沌搖擺，後來發現社會主義並非國民黨所稱的『暴政』，而是被刻意醜化了。之後關注勞工政策、婦女參政、老人年金、環保議題、反對戰爭暴力，都是受到左派的影響。」（簡錫堦）

「我出生在台南麻豆，1921年充滿左翼思想的文化協會在台中成立，我家族不少人參加文化協會，在那樣的家庭氣氛下，家裡長輩都時常會討論一些反殖民運動階級鬥爭的話題，在耳濡目染下走上左翼運動之路，並於1950年5月底被捕，直到1984年12月17日才被假釋出獄，足足坐了34年7個月的政治黑牢」。（林書揚）

訪談中也發現，受左翼思想洗禮的工運領袖，相對的在運動上比別人更有韌性，且都甘之如飴，吳永毅曾長期過著每個僅有四、五千元生活費的日子；汪立峽放棄軍法官生涯，終身不娶，無家無累，過著孑然一身的日子；簡錫堦則發現民進執政後已偏離原有的弱勢關懷而選擇脫離民進黨，另外成立泛紫聯盟，走自己的路；林書揚人生黃金月都在黑牢度過，但出獄後依舊投身社會改革運動。

三、周遭生命經驗或工作處境的自覺

周遭生命的洗鍊，讓人感受最深、也最真。曾茂興、羅美文、白正憲、林子文看見工作職場雇主不守法，員工卻莫可奈何，一股正義感而投入工運；張緒中、林惠官則不滿國營事業的工會樣板，在國家統合主義下毫無作為，進而投入工運，擔任工會代表，為勞工爭取福利；王義雄出身窮困的生命經歷，以及劉渤工作中發現同遭貧富差距造成的階級處境，讓他們走上工運。如：

「走上工運路可能與天性或是家庭背景有關。自幼失怙，塑造我不服輸、好強的個性。在桃園客運當司機，有一天下班騎腳踏車回家，不小心在路上跌倒摔斷了腿，到長庚醫院就醫，打著石膏回家療養，那段時間不能上班，就趁機讀勞基法，結果發現，公司怎麼違法的那麼離譜，還沒人檢舉，正巧有同仁發起組織工會，因而加入工會，走入工運。」（曾茂興）

「公司比較專制，老闆採家父長制，想法與基層有很大差異，比如在年終獎金發放上，我們想的是基層員工的福利，公司只想照顧的是上層的高幹，於是要求公司不能大小眼，當時還僅於追求員工的公平、正義，對於社會公平正義，還沒想過，也沒有介入」。(白正憲)

「1985 年底，公司有現金增資，但要求員工放棄認股。我們有 15 人沒放棄認股，變成公司股東。1986 年第一次參加股東會，會議不到 15 分鐘就散會，搞得我們一頭霧水，覺得被公司耍了，加上公司已 6 年沒調薪，於是有組工會爭取的念頭。那時還沒解嚴，組工會就好像毒蛇猛獸一樣。後來工會雖然籌組成功，但在公司高壓政策下，只有 36 位會員，我們戲稱每次開會員大會，出席的來賓比會員還多」。(林子文)

「1975 年出車禍，在醫院住了四個多月，發現我們勞保的病房是 16 人住一間，大家都掛蚊帳；可是公保病房就 4 人一，還有紗門窗。那時候，我滿有感受的，覺得這樣下去不行，正巧病房裡有人搞過工會，並談論組工會經過和勞工權益爭取等；回到工廠之後，開始和一些同事談組工會的事，展開籌組工會的事宜」。(羅美文)

「我們單位有一位員工背後把國民黨批評得一文不值，卻又在長官面前逢迎阿諛國民黨有多好，這種人還被推選為工會代表。當時有位同仁看不慣工會的馬屁文化，打算要自行參選工會代表，我們也支持他，但在選前卻受被長官勸退，我看不過去，跳出來選，沒想到一選就選上。還記得那時是 1987 年 7 月 7 日。」(張緒中)

「在台鐵工作，看到很多有道理的事情，政府根本講一套、做一套，看不慣主管用調職、解雇的手段對付勞工，在有點同情的心裡下，進入工會，當時鐵路局有兩大支柱，一個是成大畢業，管業務；一是台北工專畢業，管技術，我是台北工專畢業，以當時的條件，在鐵路局可以輕而易取得高位，但我寧願選擇工運路。」(林惠官)

「有兩件事讓我走上工運。1972年在屏東收電費，有位70多歲的老人，沒錢繳電費（只有基本費22元），我每個月幫他先墊。老先生生活很清苦，煮菜連油都沒有。那時，我阿姨在台北賣燒雞，爲了口感，有一道除油過程，把一大堆燒出的雞油倒掉。台北人的奢侈、南部人的清苦給我很大震撼。另外，1980年在高雄林園工作，每天早上六點多就趕上班，有天在路上看到一起車禍，夫妻同遭不幸。那對夫妻一早出門賺錢，兩個人的薪水沒有我一個人多，那天被鐵牛車撞死，鐵牛車也是討生活的窮人，一個窮人撞死了兩個窮人。當時就想如有能力，一定要幫他們講話？」（劉渤）

「還記得小時陪母親上市場買菜，一位富有的鄰否用嘲諷口吻說：『這麼窮還拿菜籃出來學買菜』。一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母親緊握我的小手，低著頭急急回家的痛苦神色。這種切膚的體驗，使我從小就深刻了解社會底層群爲生存掙扎的痛苦，也暗暗發誓一定要站在窮苦大眾這邊，爲窮人講話。」（王義雄）

他們者因職場或生命周遭的體悟，從事弱勢關懷，這些人都是從體制外有意進入體制內改革，也因此走得特別艱辛。不過，張緒中、劉渤、林惠官因有國公營事業的「金字招牌」，工作還能保住，在民營企業方面處境就大不相同，羅美文、白正憲解雇，羅美文官司輸了，白正憲打了七年才平反，曾茂興則被資遣，林子文是在半官方組織的新海瓦斯公司工作，雇主雖對他不很友善，但也不未祭出解雇令，至今工作還保得住。

四、黨國的栽培

戒嚴時代，黨國的栽培，對工運領袖而言，是參與勞工事務的是護身符，在國家統合主義的運作下，由勞從政的謝深山，勞工事務歷練完整，是工運領袖晉身百里侯範例，出身於民營企業的邱清輝，在黨國機器加持下，從產業工會，做到全國總工會，開擴勞工事務參與範疇與影響力。

「我是黑手工人，每一次生命轉折時刻，都有人向我伸出援手。1972

年，我的老長官陳英烈在國民黨輔選會上直陳登記灣選工人團體立委人選沒有代表性，省黨部主委梁永章要陳英烈在鐵路工會中找一位代表性勞工參選，條件為：鐵路工人、本省籍、年齡 35 歲以下、具高中職以上學歷、有工運成就、在黨內擔任過小組長以上職務，因而踏上從政之路。」（謝深山）

「1969 年，我在大同公司上班，家鄉八德鄉長改選，地方朋友要我以無黨籍身分參選，當時國民黨已提名，要求我不要選，甚至動用我的老闆大同公司董事長林挺生勸退，最後以遷移戶籍方式，失去競選資格，才讓風波降低。選舉完，林挺生推荐我加入國民黨，正巧台北市機器業產業工會聯合會理事長出缺，林挺生推荐下，順利的當選了聯合會理事長。同時也參加台北市總工會的選舉，直到目前還是台北市總工會常務理事。1972 年到全總擔任副秘書長，之後又接任秘書長職，全總當時推動國際勞工事務為主，因此我的主要任務是參與國際事務」。（邱清輝）

綜上可發現，台灣工運領袖，並不是一開始就有清楚的階級意識，以及運動理念。包括簡錫堦、汪立峽、白正憲、郭國文、郭吉仁、黃清賢、鄭村棋、吳永毅等，都是先有政治自覺，再走上勞工運動。這些工運領袖的政治自覺，也許來自黨外雜誌、也許來自反對運動政治人物，也因此，他們的階級思考，往往會受到政治力的牽引，推、拉間影響了工運領袖的行動決策，形成黨意與勞工意識的兩難。尤其是郭國文、黃清賢、簡錫堦皆因身兼民進黨黨員身分，難免會有兩難現象。這群工運菁英，當民進黨在野時，常扮演工運「鷹」角色，強勢批判國民黨勞工政策，如今民進黨執政，一幅「鴿」派作風，的確讓人一新耳目。

另外，曾茂興、劉渤、林子文、張緒中、王義雄、白正憲、羅美文等則因周遭生命的體悟和正義感，激揚出生命的火花，投身工運。從他們的言談中，可發現工作職場的直接傷害與剝削的痛，促使他們產生本能的自救與掙脫的勇氣，產生一種為尋找自保戰鬥意志。也由於在工作職場不幸經驗，他們投身工運，往往更堅持立場，這些人雖有較明晰的階級意識，卻受限於勞動法令及黨國體制的壓制，不是被解雇就是被判刑，張緒中因屬國營事業勞工，工作權較

有保障，但仍難逃國家機器的大網，走得跌跌撞撞。曾茂興未獲聘國策顧問前，省吃儉用，每月只花四、五千元生活費；羅美文日子也過得相當辛苦。

相對於黨國栽培的工運領袖，他們是比較幸運一群，在國家有計畫的培植下，少了一些跌跌撞撞的經驗，更走向從政之路。之前有全總前任理事長謝深山、李正宗等，目前有全總理事長林惠官(親民黨的不分區立委)、全產總理事長黃清賢(總統府顧問)、全勞總理事長侯彩鳳(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等，這些人因「工」而「仕」，也讓許多工會幹部有心追隨。

全總前任秘書長的邱清輝就坦言，體制內工會普遍在黨國政治栽培下走上工運之途，日子過得不錯，但也難以避免地受制於黨政包袱。他們積極參與工會事務，也許不是出自對勞工的關懷，而是考量自我未來的出路，這種現象可以從原本單一的全國總工會分裂成八個總工會看出來，這些人都是想爭取政黨資源，於是分別成立門戶，且都是希望政黨能夠青睞他們。

第二節 政黨取向與工運發展

透過行動的實踐，工運領袖基本上都承認工運受政黨影響既深且遠，且政治介入工運的結果，造成工運質變，同時弱化了勞動者的階級意識，而工運領袖個人的政治取向，也深深影響工運路線，形成台灣工運的低度發展與低盪。以下是訪談分析：

一、左右工運發展

政黨取向和認同左右台灣工會一直是影響工運的變數。從事工運卅年的汪立峽無力地說，工運領袖政黨利益優先於工會利益，使台灣工運即使在政黨輪替後，仍舊落入政黨御用與政治酬庸的窠臼。居處這樣的處境，白正憲也認為，工會必須被迫選邊站，才是台灣工運發展問題所在。

「政黨取向和認同明顯左右台灣工會。以全總來說，全總基層力量

薄弱，領導者自然就被國民黨操控、或者依賴國民黨。勞陣領導者則是主動的政治選擇，理念上認同民進黨，甚至屬於民進黨的一份子。台灣工運發展，無論是勞陣、全產總、勞權會、全總等，政治因素確實會影響工會領袖的作為，他們對政黨的信賴，往往使工運無法發揮力量。」(吳永毅)

「政治立場的確會干擾工運發展。比如說，全產總的領導階層，往往優先考慮的是如何維繫扁政權繼續存在，這時候所有涉及工人階級利益，在護扁的前提下變成了次要。這是非常嚴重的事，過去勞工界批判全總是國民黨的卸用工會，現在的全產總也沒有兩樣，赤裸裸地讓人一眼就看得出來。政黨利用各種關係把你工運領袖困住、抓住，工運領袖很難擺脫政黨利誘、或某種壓力、某一種說項，這是影響台灣工運發展的很重要因素」(汪立峽)

「工運對政治影響很小，政治反而影響工運較多，工會往往被迫必需靠邊，否則就很難面對各方壓力。」(白正憲)

二、弱化階級意識

政黨弱化階級意識，是台灣工運一路走來的另一沉疴，研究發現，工運領袖與政黨掛鉤就產生質變，再加上政黨階級屬性不明顯，工運領袖被吸納入政黨，在黨內很難扮演工人階級角色，替工人講話，工運領袖為了自我官位，往往會調整符合政黨利益立場說話。

「工運領袖在政治上選擇了民進黨或台獨，往往就會干擾他們的運動立場。之所以這樣，除了名利心之外，另有一個原因他們的政治考慮大過社會反抗運動，政治使命大過階級使命。再加上勞工界至今還覺得民進黨雖爛，但還比國民黨好一些，工人階段性覺醒不易。」(吳永毅)

「階級意識在台灣被淡化，是因我們沒有拉到政治的層面上去，光靠工會運動，只會落入經濟情境論裡，只要勞動條件改善、工廠賺錢，階級的意識就被蓋掉、模糊掉了！」(羅美文)

「台灣選舉一直都是用族群來操作，我選台北縣議員時，雖主打勞工議題，但我沒有助選的幕僚團，幾乎等於和過去搞工運一樣，誰有空就來幫你，沒有一個整體、全面的計畫，落得慘敗收場，畢竟工運對於選舉經驗、規劃還是欠缺的，這一點也是無法透過基層選舉，以階級意識為主要訴求。」(林子文)

「這個問題要回歸到台灣的政經背景。早期工動領袖，著力於政治上的改革，長期與各政黨合作、互動，使得整個勞工運動也被政黨瓜分，工運領袖無論加入政黨與否，都會對政黨心有所衷；第二點，台灣存在的統獨意識糾葛，造成各工會團體間的鬥爭，減弱工會領袖的凝聚力，在國家認同的矛盾沒有解決前，短期內很難有階級政黨發展空間。」(黃清賢)

從訪談中可發現，國外工運是對抗主政者，勞工階級意識較明顯，台灣工運受政治發展影響，工運是和權慾一起成長的，階級意識反成不是主要問題。

三、族群造成工運分裂

研究也發現，在台灣國家認同與族群問題也深深牽動台灣工運，不但造成工運間相互批判，成工運團體的分裂，也是弱化工人自主的主因。

「我記得統獨爭論，在自主工聯間很早就爭論，像工黨的分裂，就是因統獨問題而來。」(林子文)

「族群問題對勞工運動產生嚴重影響，很難整合，工運一旦以統獨思考，很容易就和政治掛勾。國家認同沒有解決，工運就會出問。」(郭吉仁)

「事實上，統、獨問題是政治人物為了政治利益搞出來的，不是為了弱勢勞工，政黨和勞工團體接觸，大都是利用勞工團體，不是真

正關心勞工。更可悲的是，許多勞工領袖爲了自身利益，往往甘願做政黨的附屬或次級團體，造成政黨予取予求。」（劉渤）

「如果無法擺脫統、獨意識型態，台灣勞工很難有強壯的一天。不過，統、獨已是現實中的問題，已經沒有如果，事實已經存在。台灣統獨鬥爭已跳到階級鬥爭前面，已經是取代階級鬥爭，成爲第一線鬥爭。且支持獨派的勞工領袖，幾乎只站在獨的立場，沒有站在勞工立場思考，如果他們有站在勞工立場思考，他們就不可能在許多勞工政策上處處替扁政權護航，且在護航過程中，內部幾乎沒有對這樣的行徑批判過，寧可當幫凶。」（汪立峽）

綜上分析，台灣工會發展與政治運動有著共振的作用，政治機會的鬆動，加大了工運的發展空間，但工會仍是政治結構的依變數，而非自變數。

面對國家認同爭論不休，簡錫堦成立「公平正義(泛紫)」聯盟，有意藉此撐開左、右論述，希望爲台灣族群對立開拓另一扇窗。簡錫堦的理想，卻難逃現實壓力。加入泛紫的 11⁶個成員結構分析，大都與民進黨政府關係緊密，有些團體還公開挺民進黨政府，在此結構下。泛紫成立時，工運界已看出泛紫結構性問題，甚至推動比較沒有政治立場的社運團體有意加入，但都被婉轉拒絕。事實證明，大選前泛紫動作相當大，頻頻就各項議題舉行記者會，2004 年 3 月 20 日總統大選後，泛紫行動就變得相當低調。大選後，民進黨政府宣布 6000 餘億元的鉅額軍購案，雖已嚴重衝擊社會福利預算，而一向主張弱勢優先、推動兩岸和平的泛紫卻未發一言，6 月 15 日學、社運團體發起反軍購遊行，泛紫也未參與。

從訪談過程可發現，工運領袖大部分是從政治啓蒙走上勞工運動，「從政治人到階級人」的結果，往往容易落入「先政治、後階級」的行動思考吊詭。再加上族群問題激化下，造成台灣工運山頭林立、低度發展，造成政黨予取予求。

⁶ 泛紫成員包括：婦女新知、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全國教師會、台灣勞工陣線、全國產業總工會、台灣和平文教基金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殘障聯盟、智障者家長總會、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及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

第三節 工運領袖進入體制對工運發展的影響

工運領袖走在實踐路上，應該走入體制發揮改革角色，或者在野扮演革命角色，這是工運界爭議許久的話題，他們又如何看待自我，以下是訪談分析：

一、創造工運實力

走入體制內、發揮所長是工運領袖進入體制的基本信仰。吳永毅、白正憲等認為，走入體制是創造工會實力的一種方法，握有行政資源與權力對勞工法令修訂，可以更具直接影響力。不過，進入體制，卻容易成爲外界檢視工運領袖的焦點，李正宗、林惠官在認爲工會利益優先是一標準。郭國文則認爲，具體作爲才是外界最後評價的重點。以下是訪談內容：

「工委會支持鄭村棋走入體制，一、可彰顯工委會不是社會邊緣運動團體；二、工委會當時經費吃緊，鄭村棋到市府，可將薪水回饋到工委會，以利組織推動。另外，鄭村棋也帶幾位幹部到市府接受行政體系磨練，對於組織發展也會有一定助益。更重要，希望他在勞工法令修訂議題上發揮工運理應外合功效。」〈吳永毅〉

「接受政黨職務是要發揮所長，不是要養老的。黃清賢接國策顧問，可藉此和總統府方面更有接觸，對勞工整體形象及地位的提升是有幫助。我參與勞委會修法工作，也是希望我的主張可以在法條中表現出來，如果我的建議他們不採我就不參加。」（白正憲）

「進入體制內，可利用職位就法規鬆綁方向著力，我從公以來，大部分還是可發揮功能，且朝有利勞工方向思考。如果涉及整體政策，我沒辦法單獨處理，必須大家集思廣益。」（郭吉仁）

但進入體制，個人利益與工運利益間權衡，卻容易成爲外界檢視工運領袖的焦點，訪談中李正宗、林惠官在認知上都支持工會利

益優先論。

「身為勞工領袖，只要不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可以發揮的空間會很大。」(李正宗)

「接受政黨職務，一定要把公共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前，我相信一個會替勞工爭取公益的工運領袖，即使個人因而受益，相信不會有人會反對他去接受政黨酬庸，畢竟工會領袖不是聖人，我們不能用超高標準來要求工運領袖，但是如果把個人利益置於公益之上，這樣就不對了。」(林惠官)

郭國文則認為，進入體制如何拿出具體作為，才是外界最後評價的重點所在。

「我覺得，工會幹部取得政治資源，應該檢視是他如何利用該職位。例如方來進與鄭村棋，都是從工運進入體制內，關鍵是你去了以後怎麼做？我認為既有工運組織資源匱乏情況下，工運領袖應進入體制內，重點是如何作？」(郭國文)

任職勞工局長四年的鄭村棋，以具體的事例，道出他個人作為與不作為的標準，但也感到無力感。

「過去勞動檢查，關說案件有多少，我沒讓過一件，為此得罪不少議員，但勞動檢查關係勞工生命，能讓嗎？像自立晚報關廠，只差勞工的兩百萬，為此談到半夜兩點，我敲桌大罵：『你們商人，幾億元都可以談，勞工的兩百萬不願給？』才把事情擺平。局長任內，有七次可陪議員出國玩的機會，每次都拒絕。在公務機關要能守住原則，這4年都是在搏命，但能守住多久。」(鄭村棋)

二、成為政治酬庸

創造工運實力是工運領袖的主觀認知，但誠如鄭村棋所說「能守多久」。尤其是在個人利益與工運利益權衡認知，在政治實踐現實

作為下，顯現「當局者迷，局外者清」的落差，政治參與對工運實踐，難逃「酬庸為實，實踐為虛」的批判，汪立峽就批評黃清賢和林惠官言行落差。林子文、羅美文、邱清輝等都工運領袖進入體制，勢必被收鞭，非勞工之福。以下訪談內容：

「林惠官和黃清賢都有政治和現實利益。林惠官如果僅是全總理事長，階級立場就會相當突出，因為只有和勞工兄弟站在一起才有成就感，但有了親民黨不分區立委，立委位子的比重就會大上許多。同樣地，黃清賢也有類似困擾，全產總理事長的位子，可以做很多事，卻去接受總統府顧問。」（汪立峽）

「工運走上仕途，不是工人的政治實踐。如果以他們的位置來定位，說不定他們不承認自己是工人。我舉幾個例子，像早期國民黨的葛雨琴、李友吉，現在的候彩鳳，民進黨的邱義仁、劉進與、陳菊、郭吉仁、賴勁麟、李文忠，親民黨的林惠官，他們在工人政治實踐上，實踐了什麼？」（林子文）

「過去，國民黨利用政治酬備收買工會領袖，現在各政黨仍採取這種手段，如果工會領袖不能拋開一己之私，台灣工會仍難有明天，且會愈走愈下波，尤其是工會領袖為了爭取政黨酬備，往往相互惡鬥，這種結果，對內造成工會的內訌，對外讓政黨更無視工會的存在。」（羅美文）

「在國外，工運領袖拒絕政治酬庸，政黨反而要看工會領袖臉色。幾年前，日本工會領袖來台參訪，問到全總理事長也是政黨不分區民代時，直說『把自己做小了』。因為政黨意識與勞工立場相違背時，除非去職否則只有取黨意棄勞工。再加上，工運領袖身兼數，又如何全心放在勞工身上？」（邱清輝）

「阿扁要陳菊擔任勞委會主委，我就知道不是真心關心勞工，因為陳菊是社運出身的，不是工運界出身。我舉個例子，如果民進黨沒執政，黃清賢如果不是國策顧問、不是新潮流的死忠黨員，上街頭絕對不是這麼軟趴趴。說到林惠官，國民黨執政時代我沒見過他上

過街頭；至於侯彩鳳，根本是老闆娘，當不分區立委又能怎麼樣。我早就看出來，勞工早已被政黨利用了。」（曾茂興）

綜上，進入體制、發揮所長，是工運領袖進入體制的主要論述；然而，無論是郭吉仁、黃清賢、白正憲，或是鄭村棋，訪談過程中，也多多少少說出對體制的無力感。鄭村棋坦承，「4年任內，是在博命，但能守多久？」郭吉仁說，政策的事，不可能單獨處理。白正憲則含蓄表示，建議的事不被採納就不參加。顯示，進入體制，涉及體制個國機制，實踐之路並非順暢。

在全總理事長任內曾帶領勞工兩度上街頭的李正宗，對於黨意與勞工權益的拉鋸戰有深切感受，他說，「是工頭、又是國民黨不分區立委，自己是黨員又要對抗自己的黨，角色很曖昧。」李正宗全總任內兩度帶勞工上街頭，國民黨社工會曾建議撤銷他不分區立委職務，還好李正宗事先已黨中央報備，且獲中央支持才未受黨紀處理。

訪談分析也發現，民進黨在野時期，工運比較能夠凝聚一股反對力量，民進黨執政後，原本在體制外抗爭的工運領袖，往往受政黨影響，擺脫不了政治情節。

第四節 制度困境

勞動法制的建立，是落實勞資自治的重要指標，黃越欽認為，我國早期勞動法制是想由勞資雙方協自治。因此在1936年前後訂定的「勞動契約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理論上是以工會與雇主為主體，但因故未能落實，1984年7月31日總統公布實施勞基法，行政權擴張，可說正式宣告對過去協約自治模式的放棄，而徹底實施國家統合模式，工會功能不但不見提昇反而有下降趨勢⁷。然而工運領袖又是如何看待制度困境，以下是訪談分析：

一、勞動體制缺失

（一）、白正憲、吳永毅、羅美文等從現實的集體抗爭經驗中，對

⁷ 黃越欽（2000）。《勞動法新》，台北，翰蘆，頁98。

場、廠工會結構，以及縣市區域設限下，工會組織無法壯大，難以承受資方打壓，再加下勞動法缺乏『雇主不當勞動行為⁸』規範，讓勞工行使團結權、爭議權及協商權時，更是難上加難，道出勞工運動集體行動的困境。

「台灣工會發展不夠強，這與場、廠工會結構有關，連帶也影響工會領袖的領導，工會組織型態的確讓台灣工會難以壯大；再加上工會經費都要靠政府補助，『拿人家的錢還可以罵得很大聲嗎？』今天罵人家，明天又要向人伸手勞教補助多少錢，你還想寄望這種工會領袖講話會大聲？這是不可能的事」。(白正憲)

「民、公營體質不同，造成工運發展的困境。民營企業面對的是老闆裁員、減薪，員工要的是工作權，工會有如「苦情中心」，公營企業則在反民營化問題，因此每個工會問題與狀況都不同。台灣工會幹部大都限於企業內，比較難有大的發揮空間，聯合組織工會幹部雖有較大發揮，影響力也較大，但內部雜七雜八事情一堆，要做好也不容易。」(吳永毅)

「基層勞工籌組工會最難面對的是資方打壓，但工會根本沒有類以『雇主不當勞動行為』的保護措施，雇主即使非法解雇工會幹部，勞工只能尋求一般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法院確認原來的勞動契約關係。但民事訴訟官司，往往拖上四、五年才能確定，有幾個勞工拗得下來。」(羅美文)

也因此前任全國總工會秘書長邱清輝認為，工會結構性法制未改，台灣工運無疑是灰暗的。

「工會法規定以廠、場為主體，都在單打獨鬥，外面的工運機構幾乎難以介入。比如說，某一公司發生勞資爭議，都是採取廠、場工會內部解決，縣市和全國總工會難有使力點，不像外國是以聯合會

⁸ 「不當勞動行為」是指雇主意圖破害或弱化工會活動所採取的不公平行為，其目的乃在防範雇主以不正當的手段干擾勞資關係的行為，以保護勞工或工會的權益。不當勞動行為的概念開始於美國 1935 年的華格納法案(The Wagner Act)。

為主體，任何公司發生勞資爭議，都由聯合會出面向公司談判，聯合會中有談判、法律等各類專家，可以與資方周旋，爭取最大利益。」
(邱清輝)

(二)、工會法中選舉制造成派系的把持，更是造成工運集體行動與勞動意識無法伸張的主因。

「工會法規定理事長只能擔任二任，加上採連記法選舉制，往往被少數派系把持，這也是我推動理事長直選的重要考量。」(張緒中)

汪立峽及林惠官都表示，民進黨執政對工會法及勞資爭議的修訂，是政府披著自由化的色彩，逃離公權力的角色，陷弱勢勞工於不義級的倒退修法。

「民進黨政府透過工會法及勞資爭議法的修改，強勢干預勞工的團結權及爭議權，意圖陷勞工於萬劫不復之深淵，更可惡的是明明是要破壞要控制，卻又掛著『工會組織自由化、工會會務自主化、工會運作民主化』的羊頭，弱化工會實力。」(汪立峽)

「所謂的『自由』入會。就是勞工有不參加工會的自由。有人也許會認為尊重個人自由。問題是在勞資關係中，資方因為資本易於集中，勞方則因為人數、職位、工作等問題不易集中而趨弱勢。強調勞工可以不參加工會的『消極自由』，正是提供資方方便去破壞勞工團結起來的積極自由及組織起來的團體自由，根本就是搞破壞與分化。」(林惠官)

「勞動三法修訂，權利事項不得罷工，未來老板三個月沒有薪水之類的事項，勞工沒有罷工權利。其次，包括電力、電信、郵政、石油、自來水、燃氣、鐵公路運輸、醫療、公共衛生、金融等行業爭議權被設限，即使經過調解無效，員工投票要罷工了，還得三天前通知雇主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勞工罷工權限被大幅限縮。」(林子文)

(三)、經濟困境，也是工會集體行動的最大困境，沒錢，主張與

抗爭活動，很難持續。

「工會要有錢，有錢才有實力。但現在工會法規定，入會費不得超過二天工資，經常會費不超過會員月收入的 2%。一般入會費收個三、五百元，月會百來元，工會怎麼運作？最得只得靠老闆贊助辦公室、活動費，工會幹部都得靠老闆養，根本沒有與老闆對抗的實力。」(劉渤)

「全國總工會 100 多萬個會員，平均一個人一年只收 0.8 毛錢的會費，連一塊錢都不到，完全都靠政府補助，一方面要向政府伸手要錢，一方面又得和政府抗爭，可行嗎？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政府設計的工會制度，是要控制工會，會費從基層按照比率上繳費，越上層越窮，但總工會卻又是在主導制訂政策的工會代表，導致總工會沒有錢去設計配套。抗爭時，也因工會沒錢可動員，只能靠十幾個會員工會撐場面，造成跛腳工會。法令受限多，制度設計不佳，工運難以強大。」(李正宗)

二、政治制度缺失

台灣工運脫離不了政黨政治、統獨等問題，白正憲、汪立峽認為與現行選舉制度有關，若能改成二票制，或許才有助台灣勞工階級發展。然而，吳永毅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恢復職業團體選舉對勞工最有利。

「民代選舉如改成二票制，一票選人、一要選政黨，如果採取這種方式，我敢保證大同工會至少有有 3 成以上會員會選代表勞工的黨。民進黨一直以爲勞工都會支持它，如果改成二票制，政黨票不一定會投給民進黨。因爲，民進黨屬於全民性的政黨，全民性政黨對於階級性的問題，到了一定程度後就會停頓。實施二票制，任何全民政黨處理勞工問題就不敢太偏資方。」(白正憲)

「二票制的確可以有利於階級政黨的壯大，一票投給政黨、一投給候選人。理論上，二票制雖有助於階級政黨的 formed，但還得經過實踐才能驗證，因爲選舉時還會牽扯到其他因素，到時候還是可能掉

入統、獨爭議，無法擺脫。」(汪立峽)

「兩票制根本是騙人的，最後還是政黨在決定。現在政黨擁有太多資源，他可以操縱媒體、操縱基層選舉，反而會有更大的正當性讓執政者統治，我不覺得那是公平遊戲規則，我還是覺得恢復職業團體選舉對勞工最有利，在運動上我覺得是最好。」(吳永毅)

綜上可發現，制度不健全，造成工會發展的瓶頸，現行勞動法制，主、客觀上都讓工運領袖難有發展空間。尤其是民進黨執政以來，經濟不景氣更影響到整體的勞工運動發展。工運界提出修改勞動條件、降低工時等等，只要執政黨稍稍操作，打出『先求有、再求好』說詞，就可說服許多勞工朋友，勞工被弱化更加明顯。汪立峽說，大環境決定了現實，什麼樣的時代，決定了什麼樣的政治，什麼樣的社會運動，這個制度下產生不了工運領袖，只有等待英雄出現。

第五節 家人對工運領袖從事工運的影響

勞工運動是一種弱勢運動，運動領袖必須面對被列入「拒絕聘用」之求職黑名單的風險，因此空有滿腔勇氣與熱情，也難堅持犧牲與孤獨，無親人的體諒與支持成了最要支柱，或恐外人很難想像與體會。從訪談中可發現，包括謝深山、李正宗、林惠官、黃清賢、白正憲、鄭村棋、林子文、羅美文、顏坤泉、曾茂興等都是屬於農工階級家庭出身，汪立峽、郭吉仁、簡錫堦、邱清輝、劉渤、吳永毅則是屬於公務員家庭或中產階級。這群工運領袖從事工運，家人往往受盡壓力，他們對工運領袖的態度又是如何？本研究歸納如下：

一、全力支持

不在乎可以收入養家，忍受生活困頓，及精神理念、行動上的支持，這種難能可貴的親情與力量，對工運領袖行動而言，是前進的資源更是挫折中的依靠。

「我媽在我出國前就去世了，剩下我爸，還有我姊姊、妹妹、前妻。我前妻也是搞運動的，跟我在柏克萊都受到同樣左翼薰陶。我爸是公務員，退休後領月退俸，不必靠我養，我每個月雖僅有 5、6 千元的收入，但因不必負擔父親的生活費用，節省者用還可勉強撐得過。我爸爸把僅有的八十萬元積蓄給我出國留學，有時候他難免會有一些抱怨。」（吳永毅）

「我老婆要嫁我之前就談好了，基本上是蠻支持的，但搞工運難免會有人際關係發生衝突、或是薪水發不出來，她會認為不需要這麼辛苦。」（郭國文）

「我太太的理念已經和我差不多了，家人不會反對我從事工運。我的孩子也耳濡目染，在學校也當起意見領袖，工運這條路很難走，我想如果他自己有興趣，我不反對」。（李宗宗）

「我父親未曾反對我從事工運。我太太，也非常支持。我太太住在屏東枋寮鄉下，小學畢業就和妹妹到台北討生活，那個經歷十分辛苦。她知道我有這一份心，她是蠻支持我的。我上街遊行，她都在後面幫我拉布條、發傳單，真的是夫唱婦隨。」（劉渤）

二、調適性的支持

受政治威權及戒嚴時代白色恐怖影響，在台灣，搞街頭運動及集體抗爭，家人多半心存忐忑及反對，多數工運領袖的家人不是一開始理性接受，多半過程中，奠基於親情的感性基礎，歷經掙紮、不捨，跌跌撞撞，到尊重與認同的調適。

「早期家人反對我與公司對抗，叫我不要上街頭、不要抗爭，因為他們擔心白色恐怖。直到最近幾年，家人態度才轉變，我要去遊行，他們就鼓勵我說，對呀，趕快遊行。從過去的被動接受，到現在好像互動團體一樣，跟著我成長，反而叫我把工運的理念宣導出來。」（林子文）

「太太和小孩的確有些抱怨。早年工會工作很辛苦、也非常忙，很多工會活動或開會都安排在假日，再加上參與許多國際活動，在家的時間很短，小孩子相處時間也很少。台灣的工會幹部很可憐，除了少數人外，大部分都孑然一身，甚至晚年安養都出了問題，尤其是比較強硬作風的自主工會幹部，常常被汙名化，成了企業的「黑名單」，一旦跳入、很難超脫，不像國外工會幹部可享有終身保障，這點也是台灣工運應該深思的話題。」(邱清輝)

「剛開始家人很不諒解，參與工運連律師事務所接案都越越少了，但長期之後，贏得社會尊重，家人就比較諒解。一段時間之後，我還是會回到工運。」(郭吉仁)

「還好啦，起碼我太太觀念有改變。過去當司機下班就和同事打麻將。作工運以後，努力投入，沒時間打麻將，老婆反而高興。不過，偶爾還是會抱怨、發洩心中的怒氣。我從事工運以來，家庭經濟都是我老婆一間扛起，一扛就 20 多年，我老婆很偉大，吃苦耐勞。」(曾茂興)

「因為這是自己選擇，只是太太會埋怨，下班時間不回家。我剛擔任工會幹部時，小孩學小學一、二年級，只有禮拜六、日才能和他們見面，十多年了，都是這樣子」。(黃清賢)

「母親是有些意見，過去沒錢都是向我媽要，官司還沒打贏她就過世了，欠她的錢沒辦法還她。」(白正憲)

三、有些不諒解

忠黨愛國的汪立峽父親，面對兒子搞運動及抗爭，內心衝突與掙紮更勝於一般，也因此對汪立峽從事工運不諒解又莫可奈何。

「我父親對我天生反骨個性相當憂心，我進軍法學校時，他特別送我一套文星出版，蔣廷黻寫的中國現代史，那是當時被視為最

好的中國現代史，我父親在第一冊第一頁上寫著，『立峽吾兒，自求多福』，顯然已經知道我會選擇孤獨的路。從軍校退下來後，工作從來沒有穩定過，高雄美麗島事件後，調查局人員每個月都會到我家，管區警察也常常打電話到我家，兄弟姊妹對我從事工運都覺得可惜，可說是『有些不諒解、卻又莫可奈何』。」（汪立峽）

實然面的壓力與應然面的動力，非但挑戰著工運領袖投身工運時理性與感性的思維判斷，同樣考驗著工運領袖的家人。從訪問資料中可發現，工運領袖之所以能走下去，親人的支持往往是重要的關鍵，不少工運領袖，一路走來，家人也多半能從中支持與扶助，成了生命中的動力。但對於較傳統保守的家人來說，工運是一種社會改革，也是一種近似背判與冒險的行徑，剛開始會讓他們很難接受，但從學習過程中，也都能相互尊重與包容。

第六節 工運對個人的影響

人的一生，可以有很多的際遇與選擇，工運領袖之所以成爲領袖，不管是消極被動，或積極主動；不管自利或他利的比重差異，或成果如何不同，但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但從訪談中發現，「無悔」是多數工運領袖爲自己下的人生註腳；林惠官和白正憲卻持保留態度，白正憲從事工運被資方解雇，足足打了七年官司才落幕，他坦承「受創太重，要理性說再來一次，的確說不出口」；林惠官則說，生命如果可以重新來一遍，他會選擇過安穩生活。以下是訪談分析：

一、回首來時路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是否還會選擇工運路？這是研究者在訪談後，依情依境會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工運領袖不知是否是發生「研究者效應」⁹或是一種走過後的真情，答案都以正面肯定爲多，但面對外界不同批判，有人還是感到些許無奈。以下分析：

⁹ 亦即在意研究者對他自己看法，因而自我推估想像，所回答出的意見。

「不後悔，沒有這條路，就不會有這樣的視野與格局，與豐富的人生閱歷，沒走上工運，我的人生真的是乏善可陳。同樣工作八小時，爲什麼不讓人生更豐富些？你看到我的口才、視野，就是工會提供給我的。」(張緒中)

「值得呀。老實說，實務的工作對自我成長的邊際效益是遞減，因爲在同一個領域裡，看的角度相同，我一直待在同一個位置，成長有其侷限性，雖然有成長，但幅度還是有限。」(郭國文)

「沒有留白，此生來到人間，雖沒有大貢獻，但我已經付出最大力量。人生沒留白就好了，榮華富貴過眼雲煙。再選擇還是會走上工運，我覺得沒什麼不好，很瀟灑。雖受到委屈，但那是必經的經歷」(曾茂興)

「給我再走一次，我會更積極，因爲人活著不是只爲食物，總是要爲一些理想去做。」(劉渤)

「對我來說，整個人生觀念都改變了，如果錯過這個學習過程，以後再也學習不到了。我研究所畢業後，有一個企業的基金會請我上班，薪水是這裡的一倍以上，可是去那裡，人生會空虛。」(孫友聯)

「沒有後悔，一個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我很清楚從事工運這個事業，可能要經過好幾代才能看到成果，挫折感和後悔就會產生。」(汪立峽)

「我讀建築，從事工運讓我找到自己。當初選擇念柏克萊，就是發現建築的侷限，柏克萊那幾年的訓練，對我後來搞工運很有幫助。建築是宣傳的訓練，教導你如何透過建築物宣傳建築師的理念。另外，空間訓練，如何整合繪圖員、工地工人、業主等，我都轉化到運動的設計者與規劃者上，我覺得滿有用的，學業的專業讓我學會進入工運的運作。」(吳永毅)

「我那個時期，知識份子很容易出頭天，我的同學當大老闆的比比

皆是，但我不後悔。早年在全總擔任副秘書長和秘書長，常常出差，所有青春都在工運路上，不過，我到過許多國家，也參加過不少工會活動，我以做公德的心情去做工運。有許多人在追求財富、也有不少人追逐權利，但我既然踏上工運路，我只想為勞工領域中盡一份心力。」(邱清輝)

除了無悔，也有人道出過程中與現實拔河的氣餒與挫折。

「經過這段時間是很辛苦，精神壓力很大，一方面要改變國內對工運的心態，一方面工會幹部理念也無法一下子調整，尤其幹部素質參差不齊。又要面對龐大政府組織，如果沒有相當的勇氣，很難撐下去，現在回想，當初真的很偉大。」(李正宗)

「會再選擇工運，不會改變的，只是有些意氣消沉。因為工會幹部不一定配合得上，像年假、加班費的工資給付事件，過去沒有講清楚，以為只要爭取就有了，誤解我不去爭，的確讓我有些挫折。」(黃清賢)

「再來一次，坦白說，意願不會那麼強，因為有很多不堪回首的經驗在裡面，一直努力從事工運，但有時候卻被批評成『萬惡不赦』，的很難有繼續走下去的意願，有時候想想，受創太重，要理性的說再來一次，的確『說不出口』。」(白正憲)

「如果一開始就知道走這條路，會變成這樣，我不會選擇這條路。我會選擇和我同學一樣，擔任高級工程師，生活比較安穩。」(林惠官)

二、成家太沉重

從事工運，有人持一輩子獨身、有人結了婚不敢生小孩、有人因此夫妻離異，對他們來說投身工運是另一種內在核心價值的犧牲，如：

「從事工運，天天南北奔波，僕僕風塵，不適合結婚。」(汪立峽)

「我在 2000 年才結婚。她是我們過去工會的會務人員。買了一個小套房。生活馬馬虎虎，沒有小孩，也沒有貸款。不生小孩是因為不敢生，年紀太大，智障比例太高，萬一生了一個智障兒，沒有那個經濟能力，對小孩、對自己都不是很好」。(白正憲)

「我 1988 年從事工運，老婆就離婚了，兩個孩子由我一手帶大，還好沒學壞。」(林惠官)

三、支不支持下一代也走工運

如果子女走上這條路，贊不贊成？訪談中工運領袖大都持支持或開放立場，但也有人反對子女步後塵。

「我會贊成，我一直在培養，小孩五歲就跟我上台北走街頭。台灣過去不容許獨立思考，自然不會有成熟的社會，反而變成政黨操縱下的工具。」(張緒中)

「一般人覺得工運就是去抗爭，我的子女雖不反對，但不認同，孩子現在覺得我能在政府任職且正面評價很高」。(郭吉仁)

「我兒子也走工運，我想應該與遺傳有關吧，我記得參與桃客工會時，人家叫我競選工會幹部，我不想要。我兒子卻說，「老爸你要當仁不讓」，反而鼓勵我，給我後盾。」(曾茂興)

「很支持孩子從事工運，他們知道我是爲了弱勢團體，反而變成他們在社會上學習和上進的動力。我大女兒念法律；二女兒讀台大醫學院職能治療，現在當職能治療師；小女兒在中正大學念社會福利和勞工關係雙主修，有空就跟我參加遊行」。(劉渤)

「我一定教育我女兒要關心政治，至於要不要扮演政治人物角色，我都隨她。但一定要有政治意識、政治參與。」(鄭村棋)

「家人不會反對我從事工運。孩子也耳濡目染，現在在學校也當起意見領袖。工運這條路很難走，我想如果他自己有興趣，我不反對。」(李正宗)

「基本上我不反對或限制他們走這條路，但我叫他們出來參與活動，他們不太願意出來。」(林子文)

「我反對他們走這條路。我覺得太苦，我只希望他們身體健康、平平穩穩的過日子。」(林惠官)

「無悔」是工運領袖普遍堅持的價值。這群工運領袖有人從工運走入國會、有人從工運走進行政體系、有人依舊在基層從事組織工會、有人則已淡出工運。但歷史的烙印不會因此而灰飛煙滅，這群工運領袖已為國內政治發展和勞工運動留下無以抹去的見證。

第七節 工運領袖對未來工運的觀察

最好的時代，也有最壞的想法；最壞的時代，也有充滿希望的未來想像；台灣工運的發展，並不理想，走過從前，未來會如何？工運領袖看法也呈現如下紛歧的情況：有人樂觀進取、有人卻持悲觀看法，也有人允執闕中，這或許也彰顯台灣工運的多元變化。

一、樂觀進取

吳永毅與汪立峽即使投身工運，孑然一身，但他們從政治環境及產業結構變遷分析，對台灣工運仍持較樂觀看法。

「相對於解嚴前，台灣工人原本做不到的事現在都做得到。統治者已鎮壓不了工運，工運已經形成統治者的政治壓力，這種壓力一時間不太可能發生顛覆性及改變性作用，但會有作用。可見的未來，自主工運會讓統治者不得不面對的一股政治力量，這股力量會持續

下去，且會緩慢的成長。」〈吳永毅〉

「台灣工運會再起來時，層次會更高，不會像第一階段只為經濟利益、勞動條件改善，而是帶著政治意識，帶有階級意識，也就是工人階級共同的利害關係。也因此，這幾年的低潮、觀望、投機，恐怕都是必要的過程。另外，未來工潮再起時，會捲進更多的工人，比如白領、腦力勞動者，在 80 年代工潮時，他們都置身事外，這些年來，他們已經知道也是工人，也許未來的工運領袖會是上班族或老師中的某一個人。」（汪立峽）

二、制度難破

當過立委的李正宗，從法制結構的現實論析，持保留態度。

「目前職業工會興起，產業工會逐漸沒落，除非工會結構作很大調整，否則難有作為。當務之急是先將同一性質的產業工會結合起來，例如石化業工會、電子業工會，加上職業相關工會結合，透過產業工會，結合相同理念、工作性質的勞工團體，工運才有辦法發展，否則依現有工會法設計，根本沒有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勞工意識也要建立，才有辦法結合。」（李正宗）

三、期待英雄

對工運未來持樂觀進取的汪立峽更對事在人為，充滿浪漫期待，認為只要有英雄，時勢仍有可為。

「我個人判斷未來幾年可能會有新的變化。歷史發展往往是階段論，要累積一些東西，如客觀的政治、社會氣氛下創造出工運領袖，不過現在檯面上的人比較不可能，會有新的人出來代替，只是現在還沒看到罷了。只要工人裡面出現一個有膽識、頭腦清楚、勇敢，又有領導能力者，情況就會不一樣。工人要有這種人出來，外力再去幫助他才有可能，否則外力去動不了，群眾在工運領袖的手裡，唯有工運領袖有那股氣魄，才能團結帶動工潮。」（汪立峽）

四、允執闕中

至於白正憲，則認為以現階段來說，參與的人少，很難期待，未來是否會如何，在動態社會中，沒有不可能的事，英雄與時勢是交相互動的。

「有樂觀部分、也有悲觀部分。樂觀的是，我覺得台灣成立階級政黨是早晚的事。過去國民黨太爛，民進黨隨便拿個訴求就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現在民進黨執政了，慢慢勞工會體認到他只是比國民黨較不爛罷了，並不能代表弱勢者聲音，因此階級政黨是遲早的事。悲觀是投入工運的人太少了，想想全台六、七百萬受雇者，才有幾十個專職工運者，怎能搞得起工運。但樂觀看，投入這麼少人，也能搞出一些局面。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台灣勞工沒有英雄可以造時勢，只有等待時勢的來臨。」(白正憲)

綜上分析，工運領袖無論對台灣工運未來充滿樂觀期許或現實結構性框限的無助，從訪談中，可以發現不可為而為，是從是社會運動者前進的動力與燃料，沒有悲觀的權利，或恐才是他們一路走來，對工運未來最真實的堅忍註解。

第八節 台灣工運領袖類型分析

本研究透過訪談與參與式觀察發現，台灣工運領袖在集體組織與集體行動的運動策略上，與台灣政經發展脈絡，有著必然的關係，並將台灣工運領袖分為民主草根型，順勢而為型、逆境蛻煉型和理念掛帥型等四大類型，以下是歸納性的分析，參見表 6-1。

表 6-1、工運領袖類型

類型	類型人物	運動特徵
民主草根型	如：簡錫堉、白正憲、郭國	國民黨執政時，結合民進

	文、郭吉仁、黃清賢，方來進	黨勢力，為勞工爭權益，政黨輪替後，活動力相對減弱
順勢而為型	如：謝深山、李正宗、侯彩鳳、吳海瑞、林惠官、邱清輝	政黨屬性明晰，運動上較保守與僵化，政黨實力大於勞工相挺
逆境蛻煉型	如：羅美文、顏坤泉、曾茂興、林子文	階級意識鮮明，行動策略採較激進方式，相對地也付出更大犧牲
理念掛帥型	如：汪立峽、鄭村棋、吳永毅、張緒中	有較高的學經歷背景，與政黨政治通常採取不靠邊，相對地也充滿悲壯色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民主草根型：

此一類型工運領袖，階級意識的啓蒙，來自於政治反對運動。即對政治結構的批判質疑在先，在政經發展過程上，出現對勞工不公不義的情況時，拜政治環境的開展，他們會毅然決然的投入勞工運動。如簡錫堦、白正憲、郭國文、郭吉仁、黃清賢、方來進等。

民主運動的開展，給這類型勞工運動領袖勇氣與熱情，在結構性大我的理想世界裡，此類型的運動領袖，藉由運動的組織與參與，找到自我的信心與生涯上的視野，為自我所居處的勞工階級，想像一種爭取勞工社會公平正義的途徑，結合在野黨運動，為勞工爭權益。

因此，這類勞工領袖，政黨政治光譜上較鮮明的民進黨色彩，行動理念上傾向左獨立場。此類工運領袖，在運動組織策劃與勞工教育的養成上，也能受到政黨奧援。也由於這類工運領袖在運動的策略上，是與政治運動結盟，透過政治運動的成長，他們在過程上，也學習對公共政策的訴求策略。在工會抗爭過程時，對資源的運用，也較嫻熟。

但也因為民主草根政治自覺在先，階級意識的自覺難免受制於

政治意識，在政治光譜的金箍咒下，此類型的工運領袖，在勞工運動的方向上，也始終難逃政黨支配，故其帶領之集體組織與集體行動，也易受政治勢力的拉扯。在政黨輪替前，還能嚴厲批判執政者未重視勞工權益，政黨輪替之後，親己一方拿到政權，這群工運領袖在說服其追隨者的合理性上，也發現遭逢更多的質疑與批判，使得此類型工運領袖面臨領導上的困境。

政黨輪替後，此類工運領袖，也有人因此進入權力核心，企圖透過體制內的改革，開展工運前途，但實踐狀況並不理想，政治光環並沒有如預期帶動工運領袖的身影，反而突顯該型工運領袖的歷史宿命。

二、順勢而為型

此類型工運領袖，其發跡通常並非源自個人自覺力與企圖心。而是外在環境的機緣。在工運生命中，他們通常有一些伯樂，適時給與機會與協助。國民黨執政時期，扶植的工運領袖應屬此類型。包括謝深山、李正宗、侯彩鳳、吳海瑞、林惠官、邱清輝等。

在威權政治體制中，此類工運領袖的崛起，一方面是因為環境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源自工人一種長期以來居處弱勢的自覺。然而，相較於民主草根型工運領袖，其發跡與啓蒙的過程並不是來源於政治運動，也因此組織行動的使命，並非推動社會改革，而是溝通與協調的角色，或恐是此類工運領袖能力被器重的主因。

在威權政治時代，此類工運領袖之社會認同與親人無法接納的風險較低，原因是此類型的工運領袖，其所居處的企業體質大都是公營事業，所以工運領袖在組織管理與資源、權力的掌握上有其相對的基礎，少見開疆闢土、從無到有，反而在國家統合主義的運作下，被授與更大的發揮空間，也較易奠定個人相對的社會資源。

掌握工會之社會功能，是此類工運領袖成就個人領導媚力之所在。如果有較強的企圖心，利用局勢，順勢而為，有人因此平步青雲，為工運頭子的職涯，開創不一樣的奮鬥場域，在威權時代，與其它社會運動領袖相較，其社會風險較低，但能發揮的空間可能性較大，投身工會領導，也是另一種出路。

在組織領導與集體行動上，此類工運領袖，多半受到來自於組

織的奧援或支持，在合法的基礎上，有人以個人魅力服眾，也有人是以基層會員的支持作為領導的準據。此類工運領袖的行政能力，多半受官僚組織影響，對於行政作為，有其一定的經驗能力，然也因此在此類組織運動上，較保守與僵化。一旦社會開放改革浪潮襲來，其集體行動的邏輯與組織策略，往往不是缺乏創意就可能與社會脫節。

政黨輪替後，此類型工運領袖發揮的空間，也隨者政黨輪替逐漸被取代。再者，受制於統合主義下缺乏獨立自主的運動邏輯，政黨輪替後，使此類工運領袖，在勞工權益主張上的堅持與專業執守，也面臨反差的評價與檢證。

三、逆境蛻煉型

這類型工運領袖，多半出身於民營企業體，他們投身工運，多半都是因為自己工作權或勞動條件已經惡化到最高點，所以他們才團結起來與資方抗爭。包括羅美文、顏坤泉、曾茂興、林子文等。

抗爭前他們企業可能沒有工會組織，或有工會也曾參與，更遑論論用工會去做什麼事，但是因為看不慣資方管理，才讓他們有意出來挑戰體制，過程中，他們的活動力與組織力較強者，於是便被推舉出來當領導者。此類工運領袖由於背負著強大的組織目標與鮮明行動策略，但因其組織群眾的情境正是勞工面臨最惡劣的處境之時，能擁有的資源就只有會員的支持，也因此在此類運動策略上，就會以較激烈的方法如罷工等，企圖放手一搏，故工運領袖常須承擔較高的社會風險。

但也因為居處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經驗，其勞工意識的自覺，往往在抗爭活動過程中建立，當「在己階級」意識發展成為「自為階級」意識時，此類工運領袖之工運活動的參與應該說是一條不歸路。遺憾的是因為缺乏前述二類工運領袖的政黨支援，此類工運活動開展，往往悲壯色彩十足，工運領袖的職涯，也可能因此受到嚴重的杯葛與夭折。不過，這類型工運領袖在過程中的付出與犧牲，無疑更突顯工運領袖頑強的毅力與結構性不對稱的當然宿命。

在集體行動的實踐上，此類多數並無鮮明的政治光譜與政黨意識，但在政治開放，勞工經濟權益受損的情況下，其組織謀略與集

體行動的方法及本身勞工相關知識，蒙受其它以理念型掛帥工運領袖的幫助，在過程中也處處可見，雖然工運領袖所領導之組織與集體行動，會隨著抗爭落幕而終止，但此工運領袖，在台灣工運活動與工會改造的社會實踐過程中，對基層勞工階級意識的紮根，經濟力的相對剝削感是大於政治權力。

四、理念掛帥型

此類型工運領袖，通常擁有較高的學經驗背景，外語能力也佳，因此在勞教知識與勞工運動國際經驗的承傳上，都有其優勢。他們通常出身白領階層，走上工運多數受理論知識的啓蒙，或因為理想，協助工會組織而走上工運活動這一途。包括汪立峽、鄭村棋、吳永毅、張緒中等。

在台灣工運活動的開展上，此類型工運領袖有相當大的貢獻。沒有他們的努力與參與，國家統合主義下台灣工會，其受制於國家機器的宰制本質無被揭露，藉由批判反省的思維，企圖釐清工會與政治的關係。也因此其所主導之工會組織階級意識較為鮮明，與政黨政治通常採取不靠邊的相對關係。但也因為如此，此類工運領袖的運動開展，能掌握社會資源的支持相對有限。往往窮盡一身，耗盡畢生青春，留下街頭運動時，被警棍棒打後的隱疾。

在左派信徒的理念使命下，此類型工運領袖，熱情且義無反顧的；但在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下，其遭逢的困境正是勞工階級處境的必然寫照。相較於其它類型工運領袖，此類型工運領袖對個人而言，雖充滿了悲壯色彩。

此類型的工運領袖，社會認同度反差情況明顯，在政治既得利益圈中，他們可能被視為「無可救藥」的傻子，在底層勞工心目中，他們卻是犧牲奉獻的「英雄」。若幸運，出身優渥家庭，尚能擺脫對抗資方後的經濟現實，在家人對其理念的支持下，堅定從容地現身工運；但也有因為家庭環境不算太好，在社會改革的理想中，必須承受來自於家人的不諒解，工運領袖的不歸路，又讓他們家徒四壁，孑然一身，忍受低水平的生活品質；更有人因此抱定獨身主義，無力成家，因為街頭打拼的歲月中，會有什麼樣的下場，他們也有所自知，犧牲婚姻，也成為此類型工運領袖，投身工運時，斬斷牽掛

的一種抉擇。